

力，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進一步釋放人力資源的潛力，推動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



經濟觀察家

近年來，人口老齡化及人口負增長對經濟構成顯著壓力，並且在勞動力市場上體現得尤為明顯。鑒於此，中央政府提出了完善人口發展戰略，着重應對少子化與老齡化問題，即「一老一小」問題，也同樣適用於解決結構性就業矛盾。

戶籍制改革助釋放人力資源

中國宏觀經濟剛經歷了一個周期性衝擊。在受疫情影響的三年裏，失業率大部分時間均顯著高於自然失業率水平，即存在着周期性失業。長時間的周期性失業影響了人們的就業信心與就業能力，這些影響在疫情後的經濟恢復過程中仍然持續存在。加之其他長期及結構性因素，共同導致了結構性就業矛盾的加劇。

人力資源部門常用「求人倍率」指標，即空崗數與求職人數的比例，來衡量勞動力市場的狀況。雖然高求人倍率並不一定代表勞動力市場處於理想狀態，但它確實反映供求關係的變化，揭示出某些就業群體受歡迎的程度及其需求的滿足情況。

通過觀察求人倍率的變化，我們可以發現，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恰好與求人倍率的變化相對應。以2001年至2014年的數據為例，總量矛盾逐漸弱化，求人倍率整體呈現上升趨勢，但不同年齡段的表現存在差異。

就業市場呈現結構性矛盾

總體而言，25至44歲勞動群體越來越受勞動力市場青睞，求人倍率也最高；而16至24歲青年群體的受歡迎程度趨於降低；45歲以上大齡勞動者的就業狀況在勞動力短缺嚴重期間一度有所改善，但隨後又逐漸變得那麼不那麼受歡迎。這反映了就業矛盾的變化，即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且與年齡結構緊密相關。同時，勞動年齡人口結構呈現出U字形趨勢，加劇就業結構性矛盾。

配圖是一張基於經驗依據和數據支撐的勞動年齡示意圖。

一方面，圖中向下傾斜的曲線反映了處於人口轉變最低階段的狀態，即擁有非常年輕的勞動年齡人口。這與採用的是1950年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的人口年齡結構數據，其呈現下行趨勢，很大部分人群集中在最年輕的群體，與人口轉變階段特徵是相融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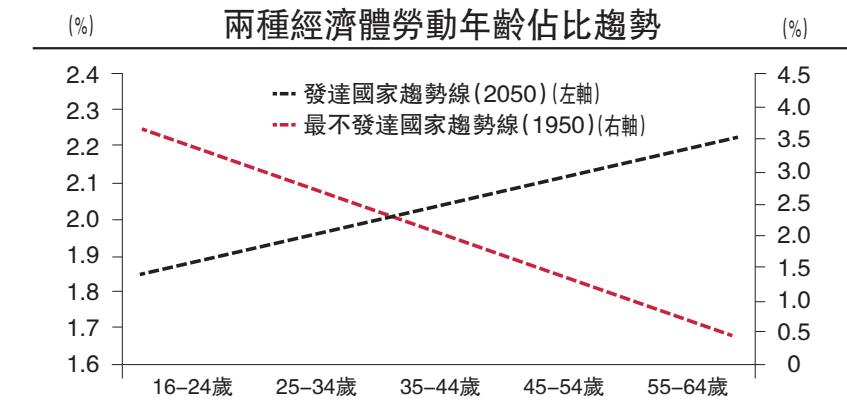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高度老齡化的國家，即人口轉變到後期或後人口紅利時期的國家，如圖中向上傾斜曲線，係發達國家在205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所呈現的上揚趨勢，正是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的體現。

以上兩條曲線，分別表現兩種極端的勞動人口年齡結構。在兩種極端情形之間，還存在一個人口轉變的中間狀態，既尚未完全脫離早期人口轉變階段，也未達到極度老齡化的人口轉變階段，例如中國的現狀。

筆者設想上述中間狀態的勞動年齡人口年齡分布呈U字形，即青年就業人群和大齡就業人群的佔比都相對較高，而中間年齡群則有所減少。

此外，中國人力資本還具有一些獨特特點。例如，少年群體及青年就業人群的受教育程度較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在24歲時達到峰值。這一現象在發達經濟體中並不存在。美國、歐洲國家、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分年齡段的受教育年限係較為平坦的水平線，24歲與64歲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基本相當。

人均受教育年限作為人力資本的代理指標，是用計量方法觀察就業技能及其回報的重要變量，但並非唯一變量。工作經驗同樣對人力資本的提升具有重要影響，隨着工作經歷增



長，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在提高。

在中國，受教育年限與工作經驗之間存在明顯的反向關係：青年群受受教育年限較高，但缺乏工作經驗；而大齡勞動者雖然工作經驗豐富，但受教育程度較低。

從這一角度來看，中間年齡段的人群可能在兩者之間取得較好的平衡，既具備較高受教育程度，又擁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從而形成更為優越的人力資本。基於這一觀察，筆者提出一個假說：勞動力市場的匹配度與年齡具有倒U字形曲線關係，即中間年齡段的人群在市場上的匹配度最佳。

我們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對這一假說進行了驗證。結果顯示，城鎮居民勞動者的就業率分年齡來看，確實呈現出倒U字形曲線——青年時期就業率偏低，中年時達到最高點，隨後下降，到大齡時期就降到比較低的水平。這一結果充分說明，勞動力市場的匹配度與年齡呈倒U字形關係。

因此，U字形的勞動年齡人口分布和倒U字形的勞動力市場匹配度，即構成了一對矛盾。它們在中國當前發展階段下同時存在，帶來了特有的與人口相關的勞動力市場特徵和結構性就業矛盾。這個時期的最突出特點，就是「一老一小」就業困難。

提升勞動者的技能水平

如何解決中國的結構性就業矛盾？筆者從人力資本培養和公共就業服務兩個方面入手，提供政策建議。

首先，加強政策工具箱的充實與貫通。過去宏觀經濟調控部門在涉及就業問題時，主要是遵循「菲利普斯曲線」，認為只要通過刺激經濟、創造足夠的需求，使經濟回到潛在增長水平，就能消除周期性失業，實現充分就業，從而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但經歷了疫情等衝擊後，即使採取了刺激性政策，經濟有所恢復，可能面臨的卻是更高的自然失業水平。

這是因為，短期衝擊疊加人口結構新特徵，如老齡化程度加深、勞動年齡人口趨於U字形分布，都可能影響就業市場的恢復。因此，僅僅依賴原有的宏觀經濟政策手段是不夠的，還需要結合公共就業服務、勞動力市場功能完善，以及相關體制機制改革等其他政策工具。

其次，從結構入手釋放總量潛力。從數據上看，無論是勞動年齡人口、勞動力人群還是實際就業的城鄉勞動者，其數量都正在從正增長轉變為零增長，進而進入負增長。解決這一矛盾的基本路徑有三點：1) 通過促進勞動力的有效流動和配置，挖掘勞動力(轉移)供給潛力；2) 轉向依靠生產率提高的新動能；3) 以人力資本質量替代勞動力數量，包括加強人力資本的培養、提升勞動者的技能水平等。

以戶籍制度改革為例。戶籍制度改革在開發人力資源方面，無論是從勞動力數量還是人力資本的角度來看，都有顯著的意義。根據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在全城鎮常住居民中，有高達37%的人口沒有在鄉、鎮或街道的戶籍。從年齡分布來看，在十幾歲到四十歲之間的年齡段，沒有當地戶口的人群比重顯著高於37%的平均水平。這部分人群中，固然有一部分可能是在城市就學、尚未確定落戶地點，但也包含了大量勞動者群體，特別是青年就業群體。

二十屆三中全會特別強調了退役軍人、農民工、大學畢業生群體的就業矛盾，「一老一小」中這部分人的問題是一個重點。儘管戶籍問題對於大齡勞動者而言可能不如對青年勞動者那麼重要，但也不無影響。許多農民工在過了四十歲或更大一些的年齡後，由於不再受就業市場歡迎而選擇返鄉，這樣他們往往只能退回到生產率更低的部門，如務農或在家鄉從事服務業，這意味着資源配置的退化和生產率的降低。

因此，戶籍制度改革不僅關乎人口流動和資源配置的優化，更是開發人力資源、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舉措。通過改革，可以進一步釋放人力資源的潛力，推動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對城鎮居民而言，戶籍制度與年齡的關係並不顯著。但在面臨老齡化問題時，他們也需要面對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改革。如果大齡勞動者的就業服務不充分，人力資源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不匹配，他們可能會在勞動力市場上遭遇衝擊。因此，延遲退休改革需要更加關注和支持大齡勞動者，加強公共就業服務和技能培訓，確保他們能夠適應新的就業環境。

最近，《求是》雜誌發表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3年第二十屆中央財經委一次會議上關於人口的講話。其中指出，中國人口少子化、老齡化發生在現代化完成之前，這會帶來一些新的困難和挑戰，要積極加以應對。

面對挑戰和機遇，我們現在需要建立新的人力資源培養機制，以推動中國的經濟可持續增長。眾所周知，衛星發射過程中需要多級火箭的推進，而在人力資本推動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過程中，第一級火箭是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當其效應遞減的時候，我們實施了高等教育擴招政策，對經濟增長產生了積極影響。然而，這兩者的作用力僅能維持一段時間，因為它們的效果都是一次性的。因此，未來迫切需要第三級人力資本火箭來持續推動經濟發展——我們需要以勞動力質量、創業能力、創新力等新要素形式，促進要素新組合，形成新質生產力。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中國製造」出口轉向新興市場

遠見卓識 王涵

過去中國主要充當發達國家生產者的角色。但在發達國家保守主義傾向上升背景下，我們正將目光轉向更廣闊的藍海——新興市場。若中國製造的、具備高性價比的中高端產品，能在新興市場確立顯著優勢的話，也將有助於打開發達國家市場，並在應對逆全球化的進程中佔據有利地位。

當前的「逆全球化」主要由發達國家所主導，這部分經濟體雖然經濟體量大，但已完成工業化進程。而近年來發達經濟體逐漸走低的經濟增速，疊加服務佔比高的需求現狀以及貿易保護情緒的抬頭，意味著其對中國出口產品——尤其是中高端產品——的拉動可能開始遇到瓶頸。

數量龐大的南方國家人群工業化的需求，則對中國進一步「國際化」提供需求基礎。2013年「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顯示出中國幫助南方國家共同發展的意願。

大部分新興市場經濟發展水平和工業化程度偏低，但巨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這些經濟體如果進行工業化，會對製造業產品產生巨大需求。在此過程中，中國在中高端製造領域具備性價比優勢將有利於中國製造在這些市場提升市佔率。一旦中國的中高端產品能夠在新興市場中進一步確立顯著的競爭優勢，銷售和生產的正循環將進一步形成。以14億中國人和50多億其他新興市場人口為基本盤的中國產品，也將在後期打開發達國家市場、克服逆全球化逆風的進程中佔據有利地位。

事實上，當前中國製造走向全球已經「在路上」。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對外綠地投資創新高，達1400億美元。分行業看，主要集中在交運設

備、金屬製品、電子元器件和其他製造業等；分區域看，主要投向是東南亞、中東和非洲地區。簡言之，全球仍有數量龐大的南方國家人群具備工業化的需求，這對中國工業體系來說提供了進一步「國際化」的需求基礎。

更重要的是，內外循環是互為促進的，國際化也將為工業化的持續深化提供發展空間。中國產業鏈優勢意味着企業創新升級具備基礎，長期來看若與國際化深化結合，將在新領域與新市場開闢新的增長空間。

開闢全新增長空間

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已形成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此基礎上，一方面，隨着中國工業體系發展和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費需求的轉變，工業部門補空白的的需求明顯收窄，需要逐漸從粗放型的工業增長模式轉向高精密、環保的方向。2017年發布的十九大報告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判斷，從之前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調整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指向工業生產在「量」上已經總體能滿足人民的需求，但需要在「質」上做提升和優化，也就是轉型升級。

另一方面，基於中國產業鏈完備及相應的人才基数龐大，中國工業化具備轉型升級的基礎。實際上，當前中國製造的創新已經從「點」進入到「面」的階段，工業化升級持續推進。在這個基礎上，如果能夠抓住其他新興市場在工業化進程中對中高端製造業需求增長的機遇，中國的工業化將在新領域與新市場開闢新的增長空間。

(作者為興業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全球仍有數量龐大的南方國家人群具備工業化的需求，這對中國工業體系來說提供了進一步「國際化」的需求基礎。

善用網絡平台捕捉客源

樓市強心針 廖偉強

人際網絡對於銷售行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人脈」等同於貴重資產，正所謂「識人好過識字」。筆者從事地產代理業多年，當然深明這個道理。須知物業買賣，動輒都是以數百萬元計，超級豪宅更隨時以億元計，通過人際網絡就能更有把握地找到潛在客戶，而且也能在當中與客戶建立關係，客戶對你的信任就不會是「由零開始」。

很多地產代理都會參加不同的商會、慈善團體、專業團體等宴會，出席大大小小的論壇、酒會等活動，大家去接觸到不同界別的人士，只要願意花上大量時間去應酬及交際，就必定能擴闊人際網絡，找到生意的商機。

在互聯網的世代，銷售行業不但不重視「人際網絡」，更要重視「媒體網絡」。互聯網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與人建立關係的重要渠道。任何人隨時都可以拿起手機拍短片，再放上社交媒體，只要有心思、有焦點，話題夠吸引，一條短片就可以做到很大的宣傳效果，並且可以與網民產生互動，而在媒體上建立自己網絡，幫助發展業務；只要流量足夠，效果是十分顯著的。

內地客對港樓興趣增

近年樓價持續下滑，對香港人而言確實不是味兒，不少人的財富都被蒸發。但對於內地人士而言，香港現在的樓價遠比以前划算，而且香港特區政府已經撤銷所有「辣招」，內地人士買樓享有與港人一樣的稅率。於是在社交媒體上就出現了大量有關香港物業或香港樓市的相關內容及資訊，令他們更加了解香港房地產的吸引力，更多來港置業。

此外，近年大量內地人才來港，亦是置業或租賃的潛在客源，他們也會透過社交媒體去尋找樓市資訊，甚至是在當中找代理。所以，「人際網絡」和「媒體網絡」都是現今地產代理做生意的利器；只要在這兩種網絡上做得好，幾時都可以客似雲來，不用過於憂慮市場是旺還是淡。

(作者為利嘉閣地產總裁)



◀「人際網絡」和「媒體網絡」都是現今地產代理做生意的利器。